

# 马克思：现实劳动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场境

张一兵

---

**【内容提要】**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进入新的经济学研究过程时，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从一般物质生产向劳动过程的转换，凸显了物质生产过程中在场劳动活动的主体地位。劳动过程的“要素”，无论是劳动活动，还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它们都是一种关系性的劳动辩证法构序中的社会场境存在。只有在劳动过程中，它们才获得劳动要素的辩证系统质，这种系统质的在场性是功能性编码生成的场境关系赋型。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劳动过程 活劳动 劳动材料 劳动资料

**作者简介：**张一兵（1956-），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

---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进入第三次系统的经济学研究之后，一开始就面对古典经济学将物质生产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充分肯定了这一前提，但他很快指出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十分特殊的关键性主体作用。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中作为“一般生产”的生产过程被转换为劳动过程，正是在这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构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劳动话语在摆脱人本学逻辑构式后再次被凸显。这一劳动话语并不是简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而是凸显物质生产过程中在场劳动活动的主体地位。在此，本文仅就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关于现实劳动过程的复杂关系场境的探索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以期研究的深入。

## 一、劳动：利用工具塑形和构序对象的物相化活动

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进入经济学思想实验之后，面对资产阶级市场—商品经济物相化的复杂关系，他慢慢地感觉到，原先自己从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中的理想化劳动，转向历史性的客观物质实践，再探究基于物质生产这一社会定在和发展的基础，在观察整个社会生活的尺度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进入经济学语境之后，特别是当他直接观察资产阶级经济生活时，他却意识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作为人对自然的能动活动出场的物质生产物相化，可以由资本有目的地驱动和生产的客观物质过程；改变自然对象和社会生活的“现实的个人”，也可以是支配和指挥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资本家、监工和科学家。李嘉图恰恰是以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客观过程，彻底抹杀了机器生产中工人的主体作用，这使马克思认识到，必须重新凸显客观的物质生产物相化与再生产中最关键性的内驱动因和真正的创造性来源不是抽象的“一般生产”，而是劳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关注的当下“现实的个人”，只能是拥有劳动能力的工人，劳动者才是人们

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生产物相化作为人能动地改造外部自然对象的“积极活动”，真正的创造性基础只能是劳动物相化<sup>①</sup>活动之上的劳动辩证法。这就使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不再仅仅从物质生产过程的视阈出发，而是必须透过物质生产过程，再次转换为从劳动过程出发，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生产话语就被再次微观化到劳动话语的更深层次。这就使马克思更加注重对劳动过程的具体观察。

马克思说：“如果从劳动本身来考察劳动过程的要素，它们被规定为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本身。”<sup>②</sup> 第一，劳动是人改造自然对象的非实体性能动活动。在哲学的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讨论作为主体与客体中介的实践，也可以指认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生产，可是马克思告诉我们，劳动物相化活动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物质生产辩证运动的本质，因为它是人为了我们的需要（目的）占有自然，真正造成二者之间“物质变换”的历史性中介的能动活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生产过程到劳动过程转换的实质，不是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的“抽象的物质生产总体创造财富”，而是手中持有工具的工人的活劳动塑形和构序对象创造了财富的真正基础——使用价值。第二，是劳动过程中作为劳动对象的劳动材料。不同于有目的的劳动创制活动，劳动材料是受动的对象。一般而言，它是不含有任何形式的主体性目的和共相之相的。并且，不同于劳动活动的当下发生和消失，劳动材料是劳动过程中恒定的到场物。通常情况下，劳动材料在劳动过程中会被耗费，转化为新的劳动产品，但不会改变自身的物性到场状态。第三，作为表现人的劳动能力的劳动资料。狭义的劳动资料就是工具，而广义的劳动资料则包括工具在内的所有中介性劳动条件。一般来说，与上述劳动材料在劳动过程中直接被耗费掉不同，劳动资料的一个特点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以重复使用和到场，它是人有特定目的的劳动能力在物质形态上的先导性重复实现。

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的“要素”，无论是劳动活动，还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它们都是一种关系性的劳动辩证法构序中的社会存在，只是在劳动过程中才获得劳动要素的辩证系统质。这种系统质的在场性是功能性编码生成的关系赋型。

劳动活动只有通过工具改变对象的过程才能实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同时从活动形式（Form der Tätigkeit）被固定为，被物相化（materialisirt）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劳动在改变对象时，也改变自己的场境（Gestalt），从活动变为存在（wird aus Tätigkeit Sein）。过程的终点是产品，在这个产品中，原料表现为同劳动结合在一起，劳动工具由于变成劳动的现实导体（wirklichen Leiter）也从单纯可能性（Möglichkeit）变为现实性（Wirklichkeit）；但是，劳动工具本身由于它对劳动材料发生力学或化学的关系，它也在它的静

① “物相化”是我从马克思思想中提炼出的新概念。在物理和化学等学科中，物相又称“物态”，一般是指物质分子的聚集状态，是实物存在的形式。实物通常以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在特定条件下又会出“等离子态”“超导态”“超流态”等物相。我所设定的“物相化”中的“相”不仅仅是“物态”之意，而兼有实现出来的主体性共相（eidos）之意。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构境中的一般物相化，是指一定的主体目的（“蓝图”）和理念对象性地实现于对象的用在性改变之中，这是看起来成事物的消逝性之缘起。日本学界在翻译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概念时通常使用“物象化”一词，而中文中与意象相对的“物象”概念本身带有某种主观现象的痕迹，所以用“物相”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透视的用在性实存对象。马克思在晚期经济学文本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经常使用“物相化”（materialisirt）一词来表达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活动在塑形对象效用过程中在物质实在中的消隐。参见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221;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4.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S. 47. 当然，人历史地实现自身的主体物相化、人创造出不同历史时间质性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的社会物相化、工业生产中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技物相化和商品市场经济场境中整体盲目物相化的经济返熵和反共相的经济物相化是更难以理解的。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止形式上被消费。”<sup>①</sup> 这说明，离开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劳动物相化活动或者活劳动是不可能从潜能成为在场的现实活动的。在劳动过程中，有目的的劳动物相化活动当下被“耗费”，它不是真的完全从有到无，而是在发生“物质变换”的同时也发生了奇妙的场境转换，通过劳动工具赋型于对象，从一种功能性的活动形式（Form der Tätigkeit）物相化地变成对象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sup>②</sup>存在。由此，劳动从非实体性的场境（Gestalt）<sup>③</sup>活动变成对象存在方式的客观物相化结果。铁匠将铁块烧红，酿酒师将粮食洗净，他们的活的劳动时间中的在场劳动活动场境成为“正在消失的东西”（verschwindend），“从活动变成存在”。不管这种物相化改变是进一步通过模具将铁块浇铸成锤头，还是通过发酵工具使粮食变成酒，这都是劳动材料通过劳动重新塑形而成的新的劳动产品。物相化的产品是在场劳动活动中特定目的（telos）和共相（eidos）之相的实现，也是被改变过的对象在新的社会历史负熵质构成的生活场境中特定用在性关系的赋型。比如，铁锤在打铁和钉钉子时的功用关系，以及美酒不同于被提炼的工业酒精在人们生活场境中生成的复杂喜庆或悲伤场境关系存在。所以，“劳动是合乎目的的活动（zweckmässige Tätigkeit），因而，从物质方面来看已经事先确定：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是实际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原料无论是由于化学的物质变换还是由于机械的变化，它在变成产品时取得了比它原有的使用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höheren Gebrauchswert）”<sup>④</sup>。这是在说明劳动过程中劳动活动、劳动资料与劳动材料的有机整合关系。劳动工具是作为“合乎目的的活动”的劳动实现自身物相化的重构模具和手段，而在场劳动活动在改变自身功能场境的同时，也造成了劳动原料的“物质变换”，在它变成劳动产品的时候，“取得了比它原有使用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例如，一段被锯下的木料在经过木匠的劳动手艺之后，转换成一张桌子，它实现了原先存在于劳动者那里的共相之相，作为具有新的存在形式和用在性有序关联场境的劳动产品，桌子获得了比原来初步入序于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的木料“更高的使用价值”。然而，在一般物相视阈中，我们只直观到作为结果的桌子，却遗忘了桌子作为“正在消失的东西”背后曾经发生的让木料成为桌子的不在场的劳动活动、劳动原料和劳动工具的复杂关系作用。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人们遗忘了让存在者成为形下之“器”的存在。

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活动通过工具改变劳动对象的物相化，实质是历史时间上存在的活劳动在产品新创造的“使用价值中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sup>⑤</sup>，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或者社会空间中的“死劳动”。“对象化”不是经济学话语，是马克思自1844年就从黑格尔-费尔巴哈那里

①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2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中译文有改动。

② 社会负熵（social negentropy）是我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新概念。在已有的自然科学观念中，熵是无序，负熵则是物质系统有序化、组织化、复杂化状态的一种量度。薛定谔在1944年发表的《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提出了“生命的本质是负熵”的观点。我认为，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观念已经基于工业生产创制出来的不同于自然负熵的社会负熵，而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以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对社会定在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和组织化作用，奠定了社会定在的本质是生产力历史构序的一般社会历史负熵质。之后，马克思又在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中，发现了商品-市场经济构式特有信息编码中的经济构式负熵质，这种经济构式负熵中的有序化和组织化恰恰是以经济无序和返熵的自发性来实现的。

③ “场境”（Gestalt）一词在马克思时代只是表征一种非实体性的存在，是马克思后来在经济学手稿中使用频次较高的概念，也是后来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提出“社会实践场”的概念。参见张一兵：《社会实践场》，《江海学刊》1988年第5期。在本次研究中，我多用“社会关系场境”概念，更偏向一般存在论的意义所指，是精神构境的现实生活基础。社会关系场境不同于布尔迪厄在社会学语境中使用的社会关系场（champ），在他那里，场的概念是指社会空间中不同力量关系的斗争场。参见〔法〕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的理论》，谭立德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8页。

④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2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0页。

⑤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2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7页。

获得的哲学话语。我们可以看到对象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关键性构序作用。“只要劳动过程的结果仍按与劳动过程本身的联系（Bezug）来考察，被看作结晶化的劳动过程（crystallisirte Arbeitproceß），它的不同因素融合在一种静止的对象（ruhenden Gegenstand）中，融合在主体的活动（subjektiven Tätigkeit）与其物质内容的结合中，那么，这种劳动过程的结果就是产品。”<sup>①</sup>也就是说，产品作为劳动过程中劳动对象化的结果，本质是劳动者在作为“活劳动之火”的时间中存在的主体性劳动活动，结晶化和物相化为社会空间中“静止的对象”。

以上面提及的桌子为例，伐木工人将树木从森林中砍下的劳动（自然失形与脱型）、运输工人将木料运到工场的劳动、木工手中的锯刨等工具中内嵌的过去劳动，以及制作椅子的目的和具体共相之相通过复杂劳动塑形等“不同因素”，对象性地融合在作为桌子这一产品的“静止的对象”中，实现为整个宏大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一个小小的“伏案”“放置物品”的日常生活用在性功能场境中。如果人们只是停留在一般物像视阈之中，那么原先让木料变为桌子的一系列劳动物相化活动就通通消失了，于是桌子就成为人们熟知却不理解的到场之物。这也是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所描述的那张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会头足倒置跳舞的桌子之“神秘性”的来源。“在对对象化劳动时间（vergegenständlichter Arbeitszeit）的物的定在（dinglichem Dasein）中，劳动只是作为消失了的東西（verschwunden），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时间的自然实体的外在形式（äusserliche Form ihrer natürlichen Substanz）而存在，这种形式对于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是外在的，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劳动只是存在于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东西。对象化劳动时间保存它的这种形式，并不像例如树木保存它的树木形式那样是由于再生产的活的内在规律（lebendiges immanentes Gesetz der Reproduction）造成的（木头所以在一定形式上作为树木保存自己，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木头的形式；而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则是偶然的，不是它的实体的内在形式 [immanente Form seiner Substanz]），对象化劳动时间在这里只是作为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而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只是在物质上存在着。因此，它的物质遭到的分解，也会使形式遭到分解。”<sup>②</sup>

在上面这段文本中，马克思突然重新启用的哲学概念，除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外，包括定在（Dasein）、消失的东西（verschwunden）和外在形式（äusserliche Form）等一批术语。马克思这里返回的思想构境并非《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话语，而是1844年前后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思想实验。当然，马克思并不是要返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哲学话语构式，而是逐渐发现，历史唯物主义那种来自经济学语境的生产话语，在透视资产阶级特殊经济关系现象时某种程度的力不从心。因此，马克思不得不重新启用一些哲学话语，包括马克思决定重新启用异化概念并重塑劳动异化批判构式。

马克思认为，活的劳动时间物相化到劳动材料自身的物性改变中，劳动活动作为消失的东西（verschwunden），生成了对象“自然实体”在失形和脱型之后一种新的物的定在（dinglichem Dasein），这不再是自然物质本有的定在形式，而是一种全新的“外在形式”。这里的外在形式并非指物质的外部，而是“反自然”的社会历史负熵中的定在形式。由此，活的劳动时间物相化为社会空

<sup>①</sup>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3-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58-5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页，中译文有改动。

<sup>②</sup>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2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8页，中译文有改动。

间中的对象化劳动时间 (vergegenständlichter Arbeitszeit)，这是马克思后来劳动价值论中“劳动时间”概念的本质。这个劳动时间已经不仅仅是李嘉图经济学中那种量的概念，而首先是工人活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活的时间 (lebendiges Zeit) 的对象化。这里，我们感觉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观念设定对象后正在消失的 (verschwindend) 构境。可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逻辑构序差异在于，马克思这里设定物性定在的活动不是观念，而是活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活的劳动时间，对正在消失 (verschwindend) 概念的使用，不是物像直观对象之假象的消解，而是直接指认在对象化劳动时间中当下发生和消失的劳动物相化活动和活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所列举的作为劳动产品的桌子中，对于本有的木料来说，不像树木自然生长是它在自然负熵中自然实体再生产的内在形式 (immanente Form)，由木匠的活的劳动时间物相化的桌子是对象化的劳动时间，它的物性定在形式只是它的“偶然形式”。当桌子破旧了再作为旧木料化浆造纸，在新的失形和祛序后还会再通过劳动物相化获得新的外在社会定在。

这也说明，在现实的劳动生产过程中，自然物并非只是一次性地获得社会历史负熵中的定在形式，劳动活动通常会表现为一系列不同共相实现的赋型过程。这是一个在十分复杂的不同目的转换中发生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叠加和整合的过程。对此，马克思以田地中的棉花到可以穿在身上的衣服的劳动物相化进程加以说明。他分析道：“如果棉花变成纱，纱变成布，布变成印染布等，印染布再变成比如说衣服，那么，(1) 棉花的实体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得到了保存 [在化学过程中，在由劳动调节的物质变换 (Stoffwechsel) 中，到处都是等价物 (自然的) 相交换等等]；(2) 在所有这些连续的过程中，物质取得越来越有用的形式 (nützlichere Form)，因为它取得越来越适合于消费的形式；直到最后，物质取得使它能够直接成为消费对象的形式，这时物质的消耗和它的形式的扬弃 (Aufhebung seiner Form) 成了人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物质的使用本身 (seine Veränderung sein Gebrauch selbst ist)。棉花的物质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得到了保存，它在使用价值的一种形式上消失，是为了让位给更高级的形式，直到对象成为直接的消费对象。”<sup>①</sup>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劳动的不断递升和叠加的系列过程，其中具体的劳动目的和共相之相本身也在不断地转换和复杂起来。从棉花到棉纱，首先已经包括了采摘棉花 (自然失形和祛序) 和制作纱锭的劳动塑形。马克思说，不要忘记“棉纱除了包含在棉花和纱锭中的劳动量以外，还具有一种新追加的劳动量”<sup>②</sup>。因为，新追加的劳动要通过纺纱从棉花的自然状态塑形为一根根可织布的细纱，棉纱再入序为整齐编织排列的布匹，印染劳动再印制不同的美观构式中的花纹或色块，最后由裁剪和缝制劳动赋型为可以上身的衣物。由此可以看到，劳动的物相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同目的和共相之相复杂塑形和构序的连续功能链接。或者说，对象化的劳动时间也会是一系列活劳动时间连续物相化的结果。正是在这个连续的劳动整合进程中，劳动材料不断获得非自然的社会历史负熵中的定在形式 (使用价值)。

“就使用价值来说，劳动具有下面这样的属性：它保存现有使用价值，则由于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而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是由于它把现有使用价值变成一种由最终目的所决定的新的劳动的对象；即从漠不相关的存在形式 (Form des gleichgültigen Bestehens) 重新变成劳动的对象材料形式，

<sup>①</sup>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2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

<sup>②</sup>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3-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变成劳动的躯体形式。”<sup>①</sup> 我们再次看到了黑格尔的这个漠不相关性（gleichgültigen）。劳动材料通过劳动在物质状态上不断发生形式改变，表现为走向社会历史负熵进程总体中生活场境里可以直接消费的越来越有用的形式（nützlichere Form）。这也说明，劳动塑形对象的使用价值并非一次性完成的，使用价值的赋型通常会是一个复杂的、连续的、合目的性的整合过程。对此，我们可以想一下，与马克思例举的从棉花到衣物的劳作过程相比，我的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使用价值会是一个何等复杂的连续劳动的复合共相叠加的合目的性总体。如果从认识论层面来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胡塞尔反对自明性的现成对象直观、主张现象学中的本质直观，因为这种本质直观可以透视一切现成对象背后作为“正在消失的东西”（verschwindend）和那些在连续劳动物相化中曾经发生且抽身而去的不在场之物。

## 二、劳动物相化场境关系中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

不仅劳动活动只有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才能成为现实的在场性存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也是一种关系性的场境存在。脱离了实际发生的劳动过程，它们就没有独立的劳动系统质。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活动与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是现实发生的劳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现实劳动把工具作为自己的手段来占有，把材料作为自己活动的材料来占有。现实劳动就是把这些对象作为劳动本身的活的机体（beseelten Leibes），劳动本身的器官来占有的过程。在这里，材料表现为劳动的无机自然（unorganische Natur），劳动资料表现为占有活动本身的器官（Organ der Aneignenden Thätigkeit selbst）。”<sup>②</sup> 这表明，在实际发生的劳动过程中，劳动材料是劳动活动及物关联的“无机自然”，没有这一对象性的物质基础，劳动活动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在场存在。这是马克思从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就已经明白的道理。可是，这里作为劳动对象的“无机自然”并不真的只是自然界本有的无机物，而很可能也有原先自然有机生命负熵脱型后的“反自然”无机物，比如作为皮革原料的动物皮毛、作为木器加工原料的植物树干等。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人类劳动力在一定的形式中被耗费，作为一定的劳动被耗费，它才能得到实现，得到对象化，因为同一定的劳动相对立的，只是自然物质，只是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外界材料”<sup>③</sup>。而劳动资料，无论是工具还是其他劳动条件，都已经是人在劳动物相化活动中所利用的自然力量。

马克思说：“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Formen der Stoffe ändern）。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sup>④</sup> 马克思在此没有展开说明，工具是人的劳动技能构式客观抽象并反向对象化为生产模板的本质。这是说，人用自己肢体直接改变对象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从开始利用木器、石器到金属，从利用水力、风力到电力，直到今天的电磁波和光能，大量的自然力量变成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工具加入改变“物质的形态”的劳动过程。在这里，劳动资料像是劳动者的主体物相化活动外溢实现的外部延伸的器官，如同更加坚硬和灵巧的肢体，它们共同建构了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全新力量。“由于这样一种简

<sup>①</sup>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27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0页，中译文有改动。

<sup>②</sup>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3-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5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页。

<sup>④</sup>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5,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S.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单的关系，即工具被用作工具，原料成为劳动的原料；由于这样一种简单的过程，即工具和原料同劳动接触，成为劳动的手段和对象，从而成为活劳动的对象化，成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结果，原料和工具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体上被保存下来，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实体就是对象化劳动实践。”<sup>①</sup> 这是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总体，劳动者的劳动物相化活动只有在使用工具、具体改变对象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出来，而“工具和原料”也只是在劳动的及物关系中才成为劳动工具和劳动原料。这说明，劳动要素不是一般物相化视阈中的可直观在场对象，而是功能性的关系场境存在。

在这里，还有一个认识论应该关注的主体物相化细节，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认的感性经验发生的主体性感知器官的“五官”。因为这是我们看到、听到和触碰外部世界的通道，马克思在那里就强调了人的五官是世界历史的产物。然而，不同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发生，在今天劳动工具和技术手段的不断改变过程中，人可以通过电子显微镜、高倍射电望远镜和CT机看到比眼睛更加丰富的东西，通过无线电接收器和其他装置听到前人的耳朵无法获得的声音和讯号，通过粒子对撞机等仪器触碰到先人从未达及的微观世界层面等。这一切都深刻地改变我们对世界本身的经验塑形和知性赋型基础。在日益复杂起来的计算机和网络信息平台的海量大数据下，基于我们大脑的思维活动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这是我们主体物相化的一个全新的层面。

这里，马克思还提出一种逻辑反证，即已经作为劳动对象化成果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存在，也必须在新的劳动过程（再生产）中获得持续不断的场境存在生命力。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脱离了现实的劳动过程，已经进入社会历史负熵进程的原料和工具只会返回到自然熵化的进程之中，这应该也是一般物相化视阈中的逻辑盲区。他说：“当原料和工具成为活劳动的条件时，它们本身又复活了（wieder beseelt）。对象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todt）在物质上作为外在的、漠不相关的形式（äussere, gleichgültige Form）而存在，因为对象化劳动本身又成为活劳动的要素，成为活劳动对处在某种对象材料中的自身的联系（Beziehung），成为活劳动的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作为手段和对象）（活劳动的对象条件）。”<sup>②</sup> 在德文中，复活（wieder beseelt）是指“又获得生命和活力”的意思。一切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只有在重新进入现实发生的劳动过程时，才能“复活”它们在社会历史负熵中获得的场境定在形式。“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变成自己灵魂的躯体，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sup>③</sup> 这里的“死”是暂时脱离劳动过程的物性到场，“生”则是在新的劳动活动中获得历史性的在场性。由此，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才重新成为“劳动的对象性”，否则，没有社会历史负熵场境存在“活化”的它们就会重返自然界无情的熵化过程。一堆堆放在遗弃库房中的木料，如果不能进入劳动过程，在木匠或工人的活劳动中转变成“桌子”和“房梁”，成为社会历史负熵构序的人们生活场境关系中赋型的具有“灵魂的躯体”，那么它们只会以与社会历史负熵进程漠不相关的形式，慢慢地腐烂变质（自然返熵）。劳动工具也是在劳动过程的使用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合目的性潜能，进而获得自身的场境关系赋型中的社会定在。

由此推演开去，所有在社会空间和生活场境中出现的用在性物性实在都是如此。只是当人们通过社会活动和交往建构起生活场境本身时，这一切“物”才都在社会关系场境中“复活”。说到底，社会定在被当下突现出来。我的玩笑是，社会生活在夜间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当所有人睡去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7-328页。

②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2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8页，中译文有改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3页。

时候,人与物都脱离了自身的场境存在,成为不在场的到场之物;每天清晨,人们起床后的“上班”“上学”“开工”和“开门”,则复活了人在场的社会场境关系世界。在这个构境意向中,与不因睡眠而改变的自然生命负熵的生理运动不同,社会历史负熵质是每天被重新复活和在场的,这种复活是人所塑形和构序的社会关系场境中“事物”“个人”和社会本身的同时复活。

在这里,马克思以纺织劳动中的纱锭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他说:“工具的情况也是这样。纱锭只有用于纺纱,才能作为使用价值被保存。否则,由于铁和木头在这里所具有的一定形式(bestimmte Form),无论是创造这种形式的劳动,还是劳动使之具有这种形式的物质,就都会毁坏而不能使用。只是由于纱锭成为活劳动的手段,成为活劳动的生命力的一个对象性的定在瞬间(gegenständliches Daseinsmoment),木材和铁的使用价值以及它们的形式才得以保存。纱锭作为劳动工具的使命,就是要被消耗,但要在纺纱过程中被消耗。纱锭赋予劳动的更高的生产率,会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会补偿工具被消费时所消耗掉的使用价值。”<sup>①</sup> 纱锭作为纺纱劳动物相化活动中的必要工具,本身就是由劳动者的活劳动时间以一定的用在性进行塑形的方式。使木材和金属在劳动制造中获得社会空间中“一定形式”的使用价值——纱锭是社会历史负熵的定在,它的工具性定在是纺纱工人塑形棉花到纱线的技艺构式在客观抽象后并反对象化到纱锭这一外在物性持存。它的用在性是在每一次纺纱生产中重新激活和重构工人的惯性劳动,这也意味着,纱锭只是为纺织劳动构式而构序,只有在纺织劳动活动中才能“成为活劳动的生命力的一个对象性的定在瞬间”。它在劳动对象化过程中被消耗,却在纺纱劳动中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如果纱锭不进入纺织劳动过程,脱离活劳动的它将会祛序和脱型于社会定在方式,落入自然熵化进程,最终被弃置于垃圾箱。这也意味着,社会历史负熵质的存在并非劳动物相化产品的直接物质属性,而是功用性的对象性的定在瞬间(gegenständliches Daseinsmoment)。

这里引申出来的一个更深的构境层是社会历史负熵质与自然生命负熵质的异质性:自然生命负熵质往往是一个肌体器官或系统的直接物质属性,动物或人的新陈代谢和每天的生命活动是自然生命负熵的存在基础;而社会历史负熵质作为一种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功能性用在性,并非劳动产品或社会创制物的直接物质属性。社会历史负熵质不仅夜间“不在场”,并且,如果它们不再得到日常生活或社会交往的场境使用,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负熵也是不存在的。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可以想一下家里库房中可能还没有处理的BP机、VCD播放机和胶片照相机,它们虽然仍是特定劳动物相化的物品,却完全失去了自身的社会历史负熵质。还有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不再发生规制作用的传统、法律和制度。意大利罗马的角斗场残遗尚在,可奴隶关系早已作古;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大教堂仍然实存,可它已经从现实的神性权力退化为文化符码;记载1901年八国联军与中国满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的《辛丑条约》的文书仍然存在,但中国人屈辱的历史场境早已一去不复返。它们有点像人类进化中退化不见的毛发和尾巴,只是它们的退化不是物性持存的消失,而是用在性社会历史负熵本身的变迁。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道:“正是纺(Spinnen)这一定的有用劳动(nützliche Arbeit),把棉花和纱锭这些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保存下来,从而使它们作为交换价值的组成部分在使用价值棉纱这个产品中再现,这是因为纺本身在现实过程中把棉花和纱锭当作自己的材料和资料,当作自己实现活动的器官(Organen seiner Verwirklichung verhält),赋予作为自

<sup>①</sup>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273-27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0-331页,中译文有改动。



己器官的棉花和棉纱以灵魂，让它们作为自己的器官发挥作用。”<sup>①</sup> 棉花作为劳动原料，纱锭作为社会历史负熵中的劳动工具，只有纺（Spinnen）这一活劳动时间，才会使已经对象化到棉花（原先采摘和清洗的劳动）与纱锭（制作纱锭的劳动）的社会历史负熵质（使用价值）再现出来，已经处于社会空间中的棉花和纱锭才能在纺的劳动物相化活动中重新激活为劳动者肢体在活动中的外延器官，获得劳动赋型的全新布匹的“灵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为了满足人的穿着和保暖需要的使用价值，正是商品神秘的“交换价值”的基础。

同理，作为劳动系统工具的“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就没有用，就是废铁和废木。不仅如此，它还会遭受自然力的破坏性的作用，也就是发生一般的物质变换，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织等等，只能成为废棉，连棉花原来作为棉花、作为原料所具有的其他用途也丧失了”<sup>②</sup>。这里的“一般的物质变换”正好是劳动物相化的反面，也就是纺织机器和纱锭作为社会历史负熵构式中特殊定在方式的劳动工具，当它们不在劳动物相化过程中被使用时，就会从社会历史负熵中的定在形式返回自然物质熵化的机器“生锈”、木制品“腐朽”和纱锭成为“废棉”的失形、祛序和整体脱型。

马克思上面这段表述在《资本论》德文第1版第1卷中被重新改写和展开。马克思说：“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dient）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受到自然的物质变换（natürlichen Stoffwechsels）的破坏力的影响。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物（Dinge），使它们由死复生（von den Todten erwecken），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Feuer der Arbeit）笼罩着，被劳动当作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功能（Funktionen），它们虽然被消耗掉（verzehrt），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的要素被消耗掉的。”<sup>③</sup> 这里新增添的理论质点是，如果劳动工具不在劳动物相化过程的场境关系赋型中发挥关系性功能，那么它的使用价值就不能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这说明，工具的社会历史负熵质并非物理空间中对象的一种凝固的物质属性，而是一种离开了劳动物相化对象的场境之负熵增殖“火焰”就不复存在的社会空间中的关系场境存在。同样，劳动负熵之“火焰”也让处于物性实在状态中的原料和机器“由死复生”，变成这种火焰的身体，它们在劳动“活力”的火焰中被消耗和“转移”，作为产品“新使用价值”的社会历史负熵要素被燃烧，并重新物相化于新的产品之中。

马克思指出：“纺纱工人只有通过纺纱，织布工人只有通过织布，铁匠只有通过打铁，才能加进劳动时间（Arbeitszeit）。而通过他们借以加进一般劳动，从而加进新价值的有目的的形式（zweckbestimmte Form），通过纺纱、织布、打铁，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棉纱和织机，铁和铁砧也就成了一种产品，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alte Form）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使用价值形式出现。”<sup>④</sup> 马克思特意标识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体是作为劳动者的“纺织工人”“织布工人”和“铁匠”，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加入活的劳动时间（Arbeitszeit），以

①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3-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6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③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5,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S. 1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4页，中译文有改动。

④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5,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S. 14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3页。

“纺”“织”和“打”，将特殊的共相之相赋型于社会空间中的对象。“劳动作为这种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纺纱、织布、打铁，只要同生产资料接触，就使它们复活，赋予它们活力，使它们成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同它们结合为产品。”<sup>①</sup>由此，劳动使棉花、棉纱和铁料脱型于自己原有的“旧形式”，通过有目的的形式（*zweckbestimmte Form*）改变为面料、布匹和铁器等“新的使用价值形式”。这里的有目的的形式（*zweckbestimmte Form*），就是希腊哲学中所指认的共相（*eidos*）之相。这说明，劳动原料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失形—祛序和重新塑形—构序，才获得了社会历史负熵中最后为了我们的使用价值。有如，棉花从田地里脱型和解构于自然关联，先在劳动中成为棉纱，后在纺纱中同时失形和祛序先前的使用价值而塑形和构序为布匹，再在裁剪和缝纫劳动的作用下最终赋型为“新的使用价值”——衣物。更进一步说，衣物本身并非仅仅是一种新的人造物性，它新获得的社会历史负熵质中的场境关系存在于它被穿着。每一次衣物的“穿着”场境，在它挂回橱柜的衣架时，都立即成为消失的东西（*verschwindend*）。这恰恰是传统认识论很难捕捉的物性在场和不在场的关系。

### 三、作为对象化劳动结晶的原料和工具

在这里，马克思还格外标识出一个重要事实：劳动过程中作为对象性实在在场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都是劳动者过去活的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成果。这意味着，在一般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中出现的物性实在，本质上都是劳动物相化活动场境关系的赋型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都是黑格尔所指认的“正在消失的东西”（*verschwindend*）。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证伪一般物像（第一层级）批判性透视的最重要的深层支撑。马克思强调，与当下发生的活劳动不同，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都是劳动者过去活劳动对象化的一种物性结果。

“物质（*Stoff*），对象化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 Arbeit*），对于作为活动的劳动来说只有两种联系（2 *Beziehungen*）：一种是作为原料（*Rohstoffs*），即脱型的物质（*formlosen Stoffe*），作为劳动的赋型的（*Formsetzende*）、有目的的活动的单纯材料；另一种是作为劳动工具（*Arbeitsinstruments*），即主体活动用来把某个对象作为自己的传导体置于自己和对象之间的那种对象手段（*gegenständlichen Mittels*）。”<sup>②</sup>这里出现的物质（*Stoff*），当然不是指劳动过程最终结果的产品，而是指与活的劳动时间相对应的（从原先自然构序关联中）“脱型”的劳动原料和劳动工具。它们不是与劳动无关的物理空间中的物质，而是社会空间关系性场境存在中的对象化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 Arbeit*）。这里的“脱型”（*formlosen*）和“赋型”（*Formsetzende*）是重要的，应该是马克思从“工艺学笔记”<sup>③</sup>中得到的重要理念，这也是我的社会场境存在论中脱型（*Deformation*）与赋型（*Formation*）的相近术语。当然，这两种对象化劳动是不同的：原料中脱型的对象化劳动是它被失形与祛序于自然关系场境的过程，而工具中赋型的对象化劳动，则是将过去定向劳动塑形和构序的技艺客观抽象后反向对象化为外部物性持存中的生产模板，以在生产过程中激活和重构惯性劳动实践。由此，劳动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3页。

②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21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6页，中译文有改动。

③ “工艺学笔记”是指《伦敦笔记》第15笔记本里马克思集中摘录的波佩、贝克曼和尤尔的工艺学史著作。按照MEGA2的出版计划，该笔记本属于第四部分第10卷（第15-18笔记本），目前尚未出版。但德国学者汉斯-皮特·米勒（Hans-Peter Müller）早在1981年就编辑出版了这些笔记内容，即《卡尔·马克思：工艺学—历史摘录笔记（历史考证版）》。参见Karl Marx, *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 Exzerpt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Transkribiert und herausgegeben von Hans-Peter Müller, Berlin: Ullstein, 1981.

中出现的所谓三个“要素”都是劳动或者由劳动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就将表现为客观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本质，再次变成劳动者创造的主体活动及其结果的纯粹劳动过程。这一新的理论认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由此马克思就可以在流通领域遭遇货币与资本、在生产领域遭遇生产条件时，毫不犹豫地将它们指认为对象化劳动的遮蔽和异化了。

马克思说，劳动原料和工具作为一种“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räumlich vorhandne Arbeit），也可以作为过去的劳动而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相对立”<sup>①</sup>。这里，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räumlich vorhandne Arbeit）就是对象化的劳动时间，它与时间上存在的活劳动相对立。也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以社会空间中物性实在到场的劳动原料、工具和其他劳动条件，其实都是被一般物像遮蔽起来的曾经以当下时间在场过的“过去劳动”的关系性场境存在，即“正在消失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活劳动物相化的对象化结果。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这里发生的一般物像迷雾在于，进入劳动过程的物性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正是过去发生的活劳动物相化的产品。但是，“在劳动过程中，具有意义的只是以前劳动的产品对这个过程来说所具有的属性，不是它们作为过去劳动的化身的定在（Dasein als Materiatur vergangner Arbeit）。任何一种自然物质通过以前的劳动而获得的属性，现在是它本身的物的属性（dinglichen Eigenschaften），它就是通过这种属性而起作用或提供服务的。这些属性以过去劳动为中介，这种中介作用本身，在产品中被扬弃了、擦去了（aufgehoben, ausgelöscht）”<sup>②</sup>。

在一般物像图景中，这里发生了一个不知不觉的变化，人们在劳动过程中遭遇到的到场劳动原料和工具上，已经没有了劳动者过去活劳动时间对象化的特殊痕迹。因为作为过去劳动对象化结果的用在性定在的属性，现在似乎成了劳动原料和工具自身在空间中的自然物质属性，它们作为劳动对象化结果的“中介作用”本身“被扬弃了、擦去了”。这是在经验感知中熟知对象“正在消失的东西”的真正所指，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赠予存在者解蔽和澄明之后的“抽身而去”。这一“擦去”的本质是，“过去表现为特殊方式（besondere Weise）、驾控目的（treibender Zweck）、劳动活动的东西，现在在它自己的结果中，在通过劳动而在产品上实现的对象变化（Veränderung des Gegenstands）中，表现为具有新的一定属性的对象，这些属性是该对象为了供使用以满足某种需要所具有的”<sup>③</sup>。我以为，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对劳动物相化（materialisirt）概念最重要的表述之一，因为劳动活动中的驾控目的（treibender Zweck）正是生产创制（poiesis）前提的目的（telos），而此处出现的赋型于对象的特殊方式（besondere Weise），则是共相（eidos）之相，这是劳动物相化具体塑形和构序的根本。这个有着自身明确驾控目的、赋型于对象特殊存在方式的劳动物相化，是比抽象的生产概念更加深入和精准的本质描述，因为它凸显了劳动物相化活动的主体性本质。比如，在已经成型为社会历史负熵质的木料和钢锯中，我们已经看不见伐木工人、打铁和制造钢锯的劳动者的劳动意图、特殊的“怎样劳动”的负熵增殖方式，以及辛劳的汗水，这一切都结晶为眼前现成的到场物性对象。我们会以为，木料和钢锯的属性就是常识中熟知的它们自身的物质属性，这就是物像迷雾升起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种复杂的认知机制已经开始慢慢地超出历史认识论的视阈，这正是马克思之后将在历史现象学中揭露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第二层级物相化的客观基础。

①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S. 19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中译文有改动。

②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3-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5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页，中译文有改动。

③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3-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5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页，中译文有改动。

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生产基始地位的强调是正确的，但依据马克思后来新的看法，人的直接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背后，本质上是劳动者有目的地改变世界的劳动过程。这样一来，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看法也会从一般物质生产走向主体性的劳动。他会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sup>①</sup> 在一定意义上，这也说明物质生产力的核心构序因素是人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这一点并不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改变，因为科技物相化的核心仍然是科技劳动。这一新的劳动话语同样是应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这一原则是同时贯穿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性逻辑原则，而这是我们过去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没有高度关注的方面。

参考文献：

- [1]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2006.
- [2]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3-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 [3]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4. 1,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8.
- [4]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2), II/5, Text,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 [5] Karl Marx, *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 Exzerpt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Transkribiert und herausgegeben von Hans-Peter Müller, Berlin: Ullstein, 1981.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编辑：刘曙辉)

(上接第20页)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在国内，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在增强社会创造力和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社会存在的变化催生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产生深刻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错误思潮存在的社会基础不会自行消失，西方价值观念也会乘虚而入。有些党员干部蜕化变质为腐败分子，从思想根源上说，就是丧失了历史自信，致使在理想信念上完全“失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吃了败仗，成为庸俗的、腐朽的人生哲学的俘虏。

因此，围绕坚定历史自信，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还任重道远，一刻都不能放松。对党员干部来说，把“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指引，在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的统一中重视主观世界的改造，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自觉抵制腐化因素的侵袭，一刻都不能放松。

(编辑：刘曙辉)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81页。